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丛书

和谐社会新论

HEXIE SHEHUI XINLUN

邹徐文 编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丛书

和谐社会新论

HEXIE SHEHUI XINLUN

邹徐文 编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谐社会新论/邹徐文编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1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丛书)

ISBN 978-7-214-04852-3

I. 和… II. 邹… III. 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中国
IV. 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6507 号

出 版 人 刘健屏

出版统筹 杨建平 汪意云

装帧设计 黄 炜

书 名 和谐社会新论

编 著 邹徐文

责任编辑 王 溪

责任校对 丁 萍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13 插页 2

字 数 317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4852-3

定 价 2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总 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从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把社会和谐作为全面小康社会的六个目标之一,到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样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在短短五年时间里,迅速完成了由舆论影响和价值导向到政策推动和制度建设的重大转变。这在我们党的执政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理论永远是实践的先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充分吸收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人类文明史上关于社会和谐的有益思想元素,汲取了我们党成立以来特别是在全国执政以来建设和谐社会的经验教训,融汇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关于解决各种现实课题、建设和谐社会的理论思考,是我们党在新时期推进伟大事业的重大理论创新。这一创新理论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丰富了社会主义本质属性,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强化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先进文化、社会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的进一步回答。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上,这一理论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一样,具有里程碑式的深远意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高屋建瓴、博大精深,需要我们从哲学基础、文化背景、经济根源、社会分析、政治诉求等不同方面和角度反复学习、深入理解、深刻领会、准确把握。

一、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

“和谐”首先是一个哲学概念,纵观人类思想发展史,古今中外的一些哲学家都有过对“和谐社会”的理想追求,都曾对“和谐”以及“和谐社会”做出大量的理论探索和生动描绘,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从尧舜禹时代人与自然的斗争和“治水平土”的传说,到夏商周奴隶社会的阶级矛盾,再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华夏先哲就总结出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自然与社会的各种对立统一的辩证智慧,初步形成关于“天人合一”、“阴阳相合”、“中庸”、“中和”、“太和”、“合和”、“圆满”的“和谐”哲学理念。“和谐”思想一直贯穿于中国哲学发展史的始终,至今仍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

据《尚书》记载,从夏商周就颇为流行“五行说”,并出现了“五行相生相胜”而化生万物的朴素唯物辩证法。但直到西周东周奴隶社会的动荡之际,周太史史伯才进一步发展了原始五行说,并总结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辩证观点,初步提出了“和谐”社会的理念。《国语·郑语》是这样记载的:“(郑桓公问于史伯)曰:‘周其弊乎?’对曰:‘殆于必弊者也,……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无味以调口,刚四肢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营)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姦极。故先王居九畹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也,而与劓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可见,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严格区别了“和”与“同”的差异,反对“去和而取同”。何谓“和”?就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诸多矛盾的均衡与统一,如悦耳的音乐是“和六律”的结果,可口的美味是“和无味”的结果,自然万物是“杂

无材”、“合十数”的结果；因而，聪明的“先王”，就要善于“以他平他”，善于听取谏工的逆耳之言，以求得社会矛盾的解决，国家才能达到“和乐如一”的“大治”局面；否则，专横跋扈，“剽”（斩断）除异己，国家“欲无弊”或者不想亡国是不可能的。史伯的这一思想可能是中国哲学史上关于“和谐社会”理念的最早的深刻论述了。

产生于殷周之际的《易经》（相传伏羲氏创八卦而演《周易》，汉代之后称作《易传》）被称作为“四书五经”的“五经”之首，一向是儒家和道家所共同推崇的经典，堪称是中华民族哲学智慧的宝典和中国文化的总源头。《周易》的核心内容，正是阴阳之和、阴阳变易的辩证思维。如《周易·乾·彖传》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也指出：“和，相应也。”后代的哲学家如魏晋王弼、北宋张载、南宋朱熹、明朝王夫之等都认为：“大（音泰）”是通假字，所谓“大和”即“太和”；并“阴阳会合冲和之气”，处于最高的“和谐”状态称为“太和”，所谓“太和，和之至也”，^①正如王夫之在《周易外传·说卦》中所说：“天地以和顺为命，万物以和顺为性。”张载、王夫之等宣扬“太和”，强调的就是世界万物既各有差异、相反相争，又相辅相成、相灭相生，即对立面之间的“和谐”是万物运动变化发展的源泉与归宿。现代学者认为：“保为常存，合为常和。‘保合太和’，使太和之气常运不息，永远融洽无偏；万物得此气以生以成。”^②纯阳不生，纯阴不长，阴阳合而万物生。以天地自然为模本的《周易》六十四卦，就是以象征纯阳、纯阴的乾、坤二卦为开端的。其余六十二卦，皆为阴阳交合的产物。此外，在卦爻之间的相互关系上，内卦与外卦中两相对应的爻画，分别为一阴一阳者，称之为“相应”。“相应”，即是阴阳之“和”。这种崇尚“和谐”的思想，既是易学的哲学精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灵魂。

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室的衰微灭亡，诸侯争霸战乱频

①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中华书局，1975年第1版，第1页。

② 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14页。

繁,中国社会处于大动乱大变革的时代,人的生命和尊严也处于历史的低谷。于是,诸子百家争鸣,其中以道、儒、墨三家并称显学,而且以道家的老庄、儒家的孔孟、墨家的墨翟等人最为著名,他们关于人、自然、社会之间的“和谐”思想对后世影响也最大。

第一,人与自然的和谐。《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是独一无二的,它派生阴、阳二气,万物背阴而向阳,阴、阳二气相交而产生“中和”之气,由“中和”之气而产生万物。这正是《周易》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天地交而万物通也。”《老子》将“和谐”视为最基本的自然规律,并以能够认识这一规律为明智,即所谓“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表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相反,“不知常,妄作,凶。”^①也就是说,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和自然是有机统一的整体,人应当与自然和谐相处,应当效法自然、遵守自然规律;否则,不了解自然规律,而又强作妄为,就会招致凶险的后果。这就是中国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最早阐发。后来,《庄子·在宥》曰:“我守其一,以处其和”;《孟子·梁惠王上》曰:“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木材不可胜用也”;《吕氏春秋·有始》曰:“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荀子·礼论》曰:“天地合而万生物,阴阳接而变化起”;《大戴礼记·哀公问》曰:“天地不合,则万物不生”;《淮南子·泰族训》曰:“阴阳和,而万物生矣”;王充曰:“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妻合气子自生矣”,^②等等,都是“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具体论述罢了。

第二,人与社会(他人)以及邦国之间的和谐。关于人与社会(他人)的和谐。《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③这里的“道”既是天地万物之本,也必然是人与社会的本源;人与社

① 《老子·十六章》。

② 王充:《论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版,第277页。

③ 《老子·十六章》。

会也应当师法自然,“反本复初”、“返璞归真”,即回归到无人力强加妄为的自然而然的和谐状态。所谓“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①这里的“大”即是“道”,“反”与“返”通。因为,在老子看来,人世间的痛苦和灾难都是违反自然的“人为”造成的,“人为”即为“伪”也,所谓“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②要“返璞归真”、“无为而治”,就要求逐步地去掉那些违反自然、违反规律的“人为”因素,所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③否则,社会失去了平衡就意味着大难临头,“无知、狂妄、浅薄、愚蠢,都将招致大难临头。”^④而孔子则主张:“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非礼勿动”,强调君子应当“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⑤他教育青年人应当“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⑥并通过诗教、乐教,使其“思无邪”,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⑦,则“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⑧最后达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⑨也就是孟子所向往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民风淳朴、政通人和的至善之“和谐”大同世界。

关于邦国之间的和谐。《周易》曰:“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而天下和平。”^⑩即主张以德服人(天下)的“和平”思想。《老子》

① 《老子·二十五章》。

② 《老子·四十八章》。

③ 《荀子·天论》。

④ [意大利] 奥尔利欧·佩奇著;王肖萍,蔡荣生译:《世界的未来——关于未来的一百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9页。

⑤ 《论语·阳货》。

⑥ 《论语·学而》。

⑦ 《论语·泰伯》。

⑧ 《礼记·经解》。

⑨ 《论语·先进》。

⑩ 《周易·咸卦·彖传》。

曰：“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①因此，老子在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上，也主张“无为”、“不争”。孔子则主张德治、仁治，他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②又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③为此，孔子还非常赞赏《韶》乐“尽美矣，又尽善也”，而“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④因为，《武》乐有武力征服的内容。墨子曰：“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又曰：“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之所不欲也。”^⑤这就是墨家所倡导“兼爱”与“非攻”。而春秋战国的兵家孙武等人就一向主张和平解决国家争端，反对轻易诉诸武力和发动战争。所谓“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⑥用兵之道，要讲究的是“内和而外威”，主张“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阵）；不和于陈（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⑦中国的兵法还将“不和”列为十四种“战患”之一。而且，中国古代称“军门”为“和门”。总之，“以理服人”、“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以戈止武”、“崇尚和谐”既是中国古代兵家的精髓和灵魂，也为当代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提供了丰厚的理论基础。

第三，人身心的和谐。《礼记·中庸第三十一》曰：“喜怒哀乐

① 《老子·三十一章》。

② 《老子·三十一章》。

③ 《论语·颜渊》。

④ 《论语·八佾》。

⑤ 《墨子·天志上》。

⑥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武经七书注释》，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13页。

⑦ 同上书，第427页。

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可能是中国最早关于人的身心和谐的论述了,其所谓“中和”主要有以下几层含义:第一,它是指那种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状态。第二,它是指人的性情状态、心理状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曰:“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也就是说,喜怒哀乐之情尚未被激发之时,还只是一种情感倾向尚不明确的本性,不喜也不怒,不哀也不乐,无所偏倚,所以称为“中”;而当这种喜怒哀乐之情被激发出来时,则合乎规矩,有所制约,所以称为“和”。第三,“中和”囊括了人的全部精神发展历程,“中”是“天下之大本”,即人的本性,“和”是“天下之达道”,即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前者是起点,后者是终点。第四,“中和”也就成为天地万物赖以存在和生长的理由和根据,天地以此而各安其位,万物以此而化育生成。《中庸》关于人的“中和”美的思想深受后人的推崇。孔子就反复强调“中和”的重要价值,如《论语·学而》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卫灵公》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述而》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雍也》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里仁》又说,君子以“里仁为美”,《论语·八佾》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即要发乎情、止乎“礼义”,又能“仁爱”,具有“温柔敦厚”的性格,这正是中国传统君子(或贤人)所应具备的“中和”之美,即一种道德美与情感美的“和谐”之美。另外,中国佛教一贯主张人生“一切皆苦”,反对人世间的一切罪恶如战争、杀生、虚假等,追求“四大皆空”与“本心真如”的“圆满”,强调通过“八戒”修行而涅槃成佛,如神秀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无使惹尘埃。”^①可见,佛教思想虽然弥漫着唯心主义的浓重色彩,但最后想要达到的不正是

① 《坛经·形由品》

一种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与人的身心和谐的至纯至善至美之境界吗?

在西方哲学史上,尤其是在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宗教神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统一的论述也大量存在。例如,古希腊最早的“智者”泰勒斯就指出:“美德乃是一种和谐,正如健康、全善和神一样。所以一切都是和谐。友谊是一种和谐的平等。”^①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②这是西方最早的人本主义哲学。苏格拉底说:“‘善基本上只是一个识见的东西’;因此知识是美德中的唯一要素”;^③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德乃是一种中庸之道,因为,如我们所看到的,它乃是以居间者为目的。”^④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认为:古希腊人的四种美德——智慧、勇敢、节制与正义——作为理想的“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而人作为政治和正义的动物,“守法是最大正义”,从而开辟西方“社会正义论”的先河。伊壁鸠鲁则说:“我们说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目的。因为我们认为幸福生活是我们天生的最高的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乃是得到快乐。”“因为肉体的健康和灵魂的平静乃是幸福生活的目的。”^⑤也正是强调了人的感性与理性、情感与道德、身与心的“和谐”的重要性。到中世纪封建神学极度贬低人的价值、压抑人性的全面和谐发展,把神或上帝看成是世界和谐的唯一原因。正如意大利神学家普洛丁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6页。

② [英]罗素著;何兆武,李约瑟译:《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11页。

③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69页。

④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第320—321页。

⑤ 同上书,第367页。

说：“所以一切人都须变成神圣的和美的，才能观照神和美。”^①托马斯·阿奎那则宣称：“美有三个要素：第一是一种完整或完美，凡是不完整的东西就是丑的；其次是适当的比例或和谐；第三是鲜明，所以鲜明的颜色是公认为美的。”但是，世界万物的一切的完整与和谐都来源于全知全能的神或上帝，因此“神是一切事物的协调和鲜明的原因”。^②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家们高扬人的意义和价值，把人对神的崇拜转向对人自身价值的弘扬，人的全面和谐发展问题又被凸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正是继承了古希腊哲学特别近代以来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中理论人学的积极成果，科学地构建了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生成）人学，深刻揭示了人的本质，把人自身的全面自由和谐发展作为其理论体系的出发点和最高诉求。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预言：“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③马克思所设想的在公有制基础上、物质极大丰富、人人平等、按需分配、人的科学文化与道德素质高度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也正是一个

二、和谐社会的文化背景

文化是一个广泛的社会存在。“文化”概念产生于拉丁文“Cultura”，原意为“耕作”，泛指人类为食住之需所从事的对外部自然世界的有目的的改造活动。之后，这一概念被古罗马演说家西塞罗融进“智慧”寓意，使其进一步又包容了人类完善内心世界过程中所具有的意志品质和精神内容。而对“文化”一词的现代含义的真正系统的阐发，应该是18世纪欧洲启蒙时代的诸如法国的伏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3页。

② 同上书，第65—6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尔泰、杜尔干、孔多塞,德国的康德、席勒、黑格尔等思想家们。他们首先较为完整地认证了文化是不断发展的使人及社会逐步得到完善的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统一,继而将其创造与统一的过程纳入文化。这为英国伟大的人种志学家 E·B·泰勒在其 1871 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中所提出的那个著名的文化定义奠定了基础。泰勒指出:“文化是一个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在社会中所获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事实正是这样,文化源自社会,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但反过来又渗透于社会组织、社会制度、社会实践的各个方面,制约和影响社会发展,是制定社会目标、思考社会问题、谋求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强调的,“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主义,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

文化的本义就是“以文教化”。在塑造人性,表达、完善社会发展愿望,将良好社会愿望转化为社会行动中文化扮演“中介”和“桥梁”角色,是构筑人性的建设者,新社会思想、道德、风气的倡导者,是新社会行动的动员者。比如语言使人能交流,哲学教人会思考,文学教人懂感情,历史学教人懂方向,法学教人守规矩,风俗陶冶人的性情,政治代表人的意志,科学启迪人的智慧,法律规范人的行为。任何社会只有根据自己的文化传统形成的社会愿望,通过文化将这种愿望转化为人们的思想观念和道德风尚,进而转化为人民大众的行动,这种愿望才是合理的,也才能获得实现。某个角度说,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社会的发展观,就有什么样的社会。一方面社会的发展往往首先表现为文化的发展,文化的变迁往往引领社会发展的方向,在社会发展中起到导向作用。另一方面不同性质的文化造成不同的社会心理、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最终影响整个社会的性质。可以说,社会发展问题,归根到底是个文化问题。尤其人类社会越发展,人离开自然界越远,文化对社会的影响越大。只有在文化与社会相统一的基础上

理解文化的社会作用,依据文化性质与状况,选择合适的发展道路,使社会发展方向、目标和道路与文化的价值追求相一致;同时在新的社会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和创新文化,促进文化的新陈代谢,所谓社会发展目标才有可能为群众接受,变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才能最终获得实现,同时也才能获得文化自身的发展。

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受内倾性地理环境、长期农耕经济和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影响,追求在“各安其分”、“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基础上,个人内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所谓“参天地,赞化育”,“与日月争辉,与天地同流”,以与天“和”;“怀物抱与”,“物我两忘”,以与物“和”;推己及人,尚礼仪,敦人伦,以与人“和”,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其要旨在于营造自我之间、不同社会活动主体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各就各位、各安其分、各得其所的社会关系状况、格局与发展趋势,也就是承认区别、矛盾但既不因此夸大区别与矛盾,也不因此而抹杀区别与矛盾,而是各就各位、各安其分、各得其所,实现共同发展,共进共生。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的“大同”理想,成为数千年来中国人念念不忘的社会最高发展境界。

历史发展一再证明,作为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世界上唯一没有被中断的文化,以和谐为核心精神的中华民族文化,是中国社会所以治多乱少、合多分少的重要精神原因,是中华民族历经艰难而绵延不绝、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精神动力。虽然中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遭遇到种种的困难,有时候天灾人祸并加,但受和谐文化影响,中华民族始终发扬忍韧、团结、奋斗的精神,散而复聚,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始终屹立不倒,证明了这一点;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由以河洛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不断向周边地区或吸纳周边地区少数民族通过交流,融合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使中华民

12

族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发展成为多民族共存的民族大家庭,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在中华民族发展的过程中,曾迭遭少数民族文化冲击,特别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大量入侵,但中华民族文化不但始终没有被中断,而且以其他文化无法比拟的涵化能力,使各种文化最终成为自身文化的一部分和一个构成元素,丰富和发展了自身文化证明了这一点;每当中国社会内部不同阶级和集团之间、地方与中央之间、先进与落后矛盾平衡被打破,内部社会和谐面临危险时,中国经常会陷入周期性的混乱和分裂,但受长期和谐文化的影响,总是在新的和谐社会秩序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和平与统一,也证明了这一点。也正因为如此,和谐精神弥漫于浩瀚的典章制度、渗透于中国人的血液、表现为中国人观念、思维和日常行为的各个方面,规定着中华民族处理一切问题的态度和方式,乃至对人类未来发展的基本看法,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核心所在和基本标志,是中华民族无法割舍、割舍不掉、也不应割舍的精神基础、继续前进的优势。封建社会后期,特别是近代以来,伴随着社会环境、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和谐为中心的中华民族文化虽然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了相当程度的僵化和不适应,甚至成为抑制社会变革发展的负面力量。尤其伴随着西方军事侵略,西方文化如影随形,潮水般涌入,以和谐为中心的中华民族文化因遭受打击和破坏而趋于消沉。但本质地看,一代代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不计个人成败荣辱,反抗压迫、反抗专制制度、反抗黑暗,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富强而斗争,正是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危机关头,中国社会处于无序和混乱状态时,以和谐为中心的中华民族文化所蕴含的自立、自主、自强精神的集中表现。

经过数千年发展,中国人也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心理。集中表现在高度重视文化发展,强调以文立国,发挥文化的社会濡化功能,不论什么样的人,士农工商各个阶层,始终以能够得到和接受文化教育为荣,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注意用文化感染人和教育人;高度重视文化的历史传承,重统序而轻超越,读书人最大的志愿就是学贯古今,把历史文化发扬光大;高度重视文

化自立与自觉,把不同民族在文化领域的斗争看成民族与民族斗争的最高方式,把维护自身文化特有的价值目标看成最神圣的事业;高度重视文化的融合与再创造,总能根据历史发展的要求,在新的社会实践中,在与其他民族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中,吸收其他文化的有益成分,创造出更加丰富的民族文化,不断促进文化发展与繁荣。事实证明,正是依靠这样的文化心理,中国人历来把社会选择当成文化选择看待,每当中国社会面临方向性选择时,始终以选择文化发展方向为前提,使中国社会发展方向与文化发展方向相一致,使社会发展繁荣始终拥有悠久而丰厚的文化支持。

当前中国社会总体发展方向和状况是好的,但经济社会改革深入发展,利益调整和观念冲突导致一些深层次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比如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相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何去何从,以什么方式处理,最终价值指向是什么,需要深入思考。有的问题比如诚信缺失、道德失范本身就属于文化问题,有的问题表面属于经济、社会、制度问题,但归根到底是个文化问题。从本质上看,这些问题归根到底都是一个思想、观念、道德问题,一个文化问题。不同的地区、组织、群体、个人,处于不同的文化当中,接受不同文化的影响,各自肯定自己行动的价值和意义,缺乏整合,缺乏共同的理想、信念、道德准则,缺乏共同价值体系的支撑,不能从社会整体进步、发展、繁荣的角度看待和处理问题,不尊重他地区、他组织、他群体、他部门和他人的利益和意志,不尊重社会发展的整体长远要求,是导致上述问题的重要原因。

十六届六中全会强调要努力建设和谐文化,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在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实践中,我们只有尊重而不是随意离开中国以和谐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背景,使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华民族传统和谐文化、西方先进的民主和科学文化相互融通,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确的舆论导向和良好社会氛围引领社会观念、社会思维方式和社会行为,又以新的社会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以宽阔的胸怀继承传统文化,吸收世界文化包括资本主义文化有益成果,又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践为基础,创新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人心,又促进各种文化取长补短,共同繁荣,最终建立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符合中华民族文化特点与精神本质,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

三、和谐社会的经济根源

西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在构建其古典经济学说的核心理论时曾有过这样一段伟大而精辟的论述:“(资本经营过程中的)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与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并非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由此可见,利益、利益关系及分配关系构成了和谐社会建设的经济根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即使用保守的数字,发展速度也在两位数以上,而且我们还持续了十年。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0万亿元,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四位,中国的财富已占世界的很大份额。按照一般规律,GDP增长有一个周期,大致十年为一个周期。我们从1992年到2002年是十年,但到2002年我们中国经济并没有回落,而且持续在高峰走,除了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中期,我们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压力。现在理论界有